

试论云冈石窟 供养人的服饰特点

□ 李雪芹

在云冈石窟数以万计的人物雕刻中,供养人的服饰最能直接反映出北朝的社会特征,虽然供养人的雕刻数量有限,再加上其雕刻位置不是很显著,因而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一些文章作过论述,但鲜有详论者。本文试图通过对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供养人服饰雕刻的调查分析,阐述北朝社会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风貌,以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北魏平城时期服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生活习俗。

在云冈石窟中,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供养人(本文所指的供养人不包括供养天人和供养菩萨)的雕刻,它们或簇拥在佛龕周围,或位于窟内四壁下部,更多地则是位于龕下、铭刻石(或博山炉)两旁,就其位置而言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位于佛龕、佛教故事龕周围,雕刻于主像旁侧。一般雕刻供养人的数量较少,以1~2人者为多数,是佛龕雕刻内容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烘托龕内雕刻的主题内容,渲染气氛,增加画面的可读性。他们双手合十或双手捧物作供养状,虔诚地拱立在主佛周围。(2)位于盂形龕或盂形龕楣内的供养人。盂形龕楣内多数是刻七佛,但也有一小部分龕楣内正中雕刻坐佛,两侧各雕三躯供养人的形象,这些供养人雕刻均侧身面向正中坐佛,有的还雕有圆形头光,发髻高耸,双手合十,双腿呈胡跪状,着帔帛,具有较强的装饰性。(3)位于佛龕下铭刻石(或博山炉)两旁,这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两列供养人,均侧身面向中央,多数情况下是男女分列,相当数量供养人行列的首位为僧侣形象,其“敷导民俗”的作用可见一斑。(4)位于窟内四壁下部。二、三期这种形式较普遍。主要分布于大、中型洞窟的下部(西部小窟也

有这种形式,供养人雕刻的高度在40~70厘米不等),其高度均在1.5~2米左右,是对平城各类人物的客观描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的社会结构。

从云冈供养人服饰雕刻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僧侣服饰;二、鲜卑服饰;三、汉式服饰;四、胡风汉服。其中前三类是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雕刻的主流,后一类只是将前面提到的第二、三类服饰加以揉和后形成的一种服装样式,并不是云冈供养人服饰雕刻的主要表现形式,雕刻数量亦十分有限。

一、僧侣服饰

供养人中的僧侣形象,在云冈石窟中的雕刻数量并不是很多,其表现形式,多数位于供养人行列之首位,也有呈比丘(或比丘尼)供养行列出现的。其服饰特征十分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 袒右肩式袈裟

袈裟是佛教徒的法服。其形制为长布不加任何裁剪,法衣裹身,又称赤布僧伽梨。袒右肩式袈裟,即斜披袈裟,以赤布僧伽梨绕腰络腋,覆左肩,袒右臂(或半袒右臂),露出僧祇支。这种服装源于古代印度人的一般服饰^[1]。《大智度论》卷第七《佛土愿释论》中说:“佛初成道,菩萨夜三昼三。六时礼请,偏袒右肩合掌言……”。“是以天竺国法,尽敬于所尊,表诚于神明,率皆袒服,所谓去饰之基者也。”^[2]由此可见,袒右肩服饰是古代印度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服饰,印度佛像的服装亦如此。而在中国,裸肩露肉是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是一般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魏时请僧于内恣,官人见僧偏袒,不以为善,遂作此衣施僧,即偏衫右边。”这种服装就是所谓的“因复左肩,右开左合”的形式。与云冈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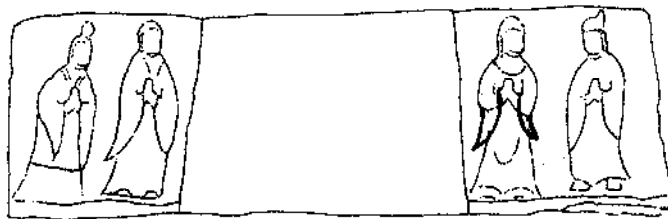
图一 半袒右肩式



图二 通肩大衣 A 式



图四 通肩大衣 C 式



图三 通肩大衣 B 式

窟第一期造像中的佛像服装完全相同。这种袈裟在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中有两种表现样式，A：半袒右肩式。以长布绕腰络腋，覆左肩，右臂呈半袒状，一部分衣服从左臂绕下，个别内雕长裙。这种服饰多见于云冈第二期雕刻，后逐渐消失（图一）。B：偏衫。偏衫这种形式多出现在云冈第三期石窟雕刻中的龕楣内，不见于第一、二期。绝大部分用于表现七坐佛，只雕刻出服装的右衣领，其余无雕饰。这种服饰表现僧侣供养人的仅是个别现象。这种形式的服饰也可以说是偏袒右肩式袈裟在第三期雕刻中的一种简化后较程式化的表现形式。

第9窟前室北壁门拱右侧二佛并坐龕左侧雕了1 躯弟子供养形象（圆形头光为后世所绘），身着半袒右肩式袈裟，袈裟上雕刻有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格子，融入了田相衣的成份，二者结合，形成这类服饰的另一种形式。清代在其身上大施彩绘，使其色泽艳丽，同时又不失其高贵典雅的儒士风范。

2. 通肩大衣

通肩大衣是僧侣供养造像的主要服饰之一。源于犍陀罗佛像的服饰。“以角搭肩，衣便绕颈”的通肩式袈裟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有三种表现样式。A 式：通肩大衣，圆领窄袖，衣下部为直筒形，且大衣下摆平直至脚踝处，露足（图二）。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门拱右侧二佛并坐龕的右侧雕1 躯弟子供养形象，着圆领通肩衣，窄袖，通肩大衣上雕刻有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格子（该像后世予以彩绘），通肩衣下摆呈圆弧形，内着间色长裙至脚踝处。该服饰为此类服

饰的变异形式，它结合了田相衣与女性间色裙的特点，有可能是比丘尼的服饰。B 式：圆领宽袖至肘下部，大衣下摆呈“八”字形，且衣裾向外扬，露足（图三）。C 式：通肩大衣，领口呈小V 字形领，且有宽缘，广袖，腰系蔽膝，下着间色裙（图四）。通肩大衣在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雕刻中有较多的表现，它的款式前后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它的衣袖经历了由窄变宽、衣身由直筒到“小喇叭”形的变化，说明了北魏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鲜卑与汉式服饰交流、融汇的社会变革的实情。其中 A 式出现的时间较早，C 式出现时间相对较晚。

3. 双领下垂式袈裟

又称交领大衣。此种衣服是以袈裟覆双肩，双领下垂于胸前或相交，其形状类似对襟衣，领口处露出僧袷支。双领下垂式袈裟在云冈石窟中有两种表现



图五 双领下垂式 A 式



图六 双领下垂式 B 式

样式。A式：交领大衣。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双领于胸前相交，左衣领压右衣领，袖子较窄，衣裙下摆呈直筒形，领、门襟、下摆有缘，内着长裙至脚踝处，有较明显的鲜卑服饰的某些衣着特征（图五）。第二种的式样如19—2窟门口左侧下部比丘供养的雕刻，光头，双领下垂至胸前相交的宽袖大襦，内着僧祇支，下着裙，露履。表现出较浓郁的汉服风韵。显然这种形式的服装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B式：双领下垂但不相交（图六），是比丘尼的一种服饰，亦有两种表现形式。①双领下垂至胸部，领口部露出僧祇支，衣下摆呈圆弧形，袖口较宽大，下着间色（百褶）裙；②双领下垂至胸部，曲领（即小方领），领口处露出僧祇支，袖口宽广，且出现衣襟方角向外翻的样式，衣下摆呈圆弧形，下着间色（百褶）裙；这种服饰的出现显然受南朝褒衣博带服饰的影响，领口由相交到相对，袖口由窄变宽，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是鲜卑统治集团改革旧体制创建新的礼制的具体体现。

4. 田相衣

在袒右肩式（半袒右肩式）袈裟和通肩大衣两种服饰上，衣纹雕刻出横竖裁割呈方格状的形式，当为现存较早的田相衣^[4]。关于田相衣，《释氏要览》卷上云：方形田相“象征田相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法身慧命也。”由此看来，田相衣具有宗教象征意义。因而在云冈石窟僧侣供养人雕刻中，着此衣者也不乏其人（图七）。最典型的是第18窟东壁的弟子供养



图七 田相衣（东壁、前室北壁）

雕刻。该弟子像身着通肩式田相衣，宽袖，领口处雕有装饰（类似于盘领），通身雕有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斜格。第二期雕刻中也屡见这种服饰，特别是太和年间较流行，第三期雕刻中消失殆尽。

综上所述，僧侣供养人雕刻虽不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的主流，但其服装样式较多，有一些与佛像同出一辙，有一些看来就是当时僧人们的日常服装，我们从中不难找出其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特点，有些样式或多或少体现了鲜卑服饰的一些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地域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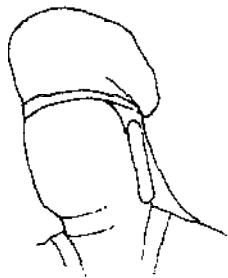
二、鲜卑服饰

拓跋鲜卑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拓跋氏的祖先发源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以射猎为业^[4]。大约在东汉时期，鲜卑部就开始了大规模南迁，经过不断的征战、迁移，逐步发展壮大。在南迁的过程中，蒙古草原上民族融合的局面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匈奴势力日渐衰弱，取而代之的是鲜卑拓跋势力的强大。拓跋鲜卑于公元386年建立封建国家，定都盛乐。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在鲜卑拓跋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民族融合、向汉民族学习先进文化，不断充实本民族，使鲜卑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过去的记述中一般将鲜卑族纳入胡人的范畴，通过对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的调查与分析，我认为鲜卑服饰特征鲜明且自成体系，不能与胡服相混，而应独立成章。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鲜卑服饰贯穿始终，是北魏时期供养人服饰的主要装束，也是这一时期服饰流行的主流。

1. 男式服装

男式鲜卑服在石窟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现。男性供养人一般头戴鲜卑帽，内着圆领衣，外罩交领窄袖大袍或左衽衣，领、袖及下摆皆有缘，特别是下摆的缘较宽，似镶皮毛之边，腰束宽带，下着小口裤，脚蹬靴。

鲜卑帽，又称突骑帽、帷帽。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圆帽、垂裙（所谓裙，据长沙马王堆新出竹简记载，凡器物下脚加有丝绸边沿的，通称作“裙”），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男女通用的一种首服。在云冈石窟雕刻中，着鲜卑服的男女供养人大多数头戴此帽，但帽的形式不尽相同，



图八 鲜卑帽



图九 1. 太和七年碑旁的鲜卑帽



2

图九 2. 宁夏固原北魏墓木板漆画中的鲜卑帽

男女帽子式样也有一定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种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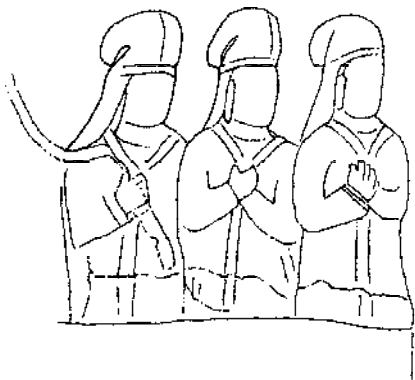
A式：圆顶风帽，帽筒较深且材质较软，帽顶塌在脑后，在侧面看形成一条直线（或斜线）。帽口镶有宽边（或者是束帽口沿的宽带），垂裙呈直线下垂至肩。这种帽形是云冈石窟所表现鲜卑帽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少见于同时期其它石窟或墓葬中（图八）。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凡着此帽者，一般均着交领衣，下着小口裤，根据衣饰特征判断，此帽应为男性所戴之帽。这种帽式在“昙曜五窟”中已露端倪，第7窟西壁中层故事龕中雕刻的供养人已戴此帽（大型供养人行列最早出现在该窟下层，惜风化严重，已无法辨识），说明在和平年间开凿石窟中的鲜卑供养人已着此帽（图九，1）。太和七年（483年）碑左侧的供养人雕刻也着此形帽。纵观云冈石窟第二期雕刻中的男性鲜卑供养者均戴此帽，这种帽形也见于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男俑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魏墓出土孝子故事图漆棺残片中的男性人物（图九，2）^[5]。在第三期雕刻中已难寻这种帽子的踪迹。该种帽形有个别造像帽顶中间有中缝，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女乐俑和女侍俑帽式相近似。但从服饰上看，该列供养人应为男性。

B式：圆顶风帽（雕刻中亦有帽顶前高后低或其帽顶中部呈下凹式两种形式），硬质帽顶，帽口束宽

边，垂裙在帽后，一般呈弧线至肩部。云冈石窟雕刻中的鲜卑帽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此种帽形在云冈石窟雕刻的第一、第二、第三期供养人中均有表现。且女性戴此帽者居多，第三期雕刻中也有一部分男性供养者着此帽。在云冈石窟第二期供养人雕刻中，大多数女性头戴帽顶中部下凹的鲜卑帽（图一），与近年来平城（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同时期陶俑或墓室壁画中的供养人的帽式基本相同。足以说明北魏太和年间平城地区流行这种帽子的样式^[6]。

C式：帽子顶部类似于笼冠，帽口无边饰，垂裙至颈两侧与颈后。帽子的上半部分似为方形。凡着此类帽子者，供养人的个体一般较小，多数不超过40厘米。这主要是因为工匠在雕刻中，部分细节无法描述，再加上供养人雕刻的个体较小，雕刻日趋简化，所以出现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其雕刻手法十分简练。这种形式多见于第三期雕刻中的供养人。

吕一飞先生在其《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一书中称鲜卑帽：“其帽大致为一方形，垂裙至肩”^[7]。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从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的鲜卑帽形式以及近年来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陶俑情况来看，鲜卑帽的顶部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长帽，即帽筒较深且向后塌下；另一种帽顶应为浑圆形，其顶部中间呈下凹形，也有呈前高后低式。



图一〇 圆顶风帽

吕先生之所以认为是方形，是对云冈石窟雕刻中一种程式化表现的误解。

D式：尖顶圆形毡帽，也称浑脱帽。帽口为圆形，帽顶部为尖状，质地较厚重，是胡服中的一种帽子形式。戴此类帽子者，面相均为胡人相，一般着右衽衣，交领，窄袖，衣长至膝下，衣领、袖、下摆有缘，下着靴。可能是当时在平城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其它少数民族服装式样的再现。这种帽子形式，也见于同时期佛传故事龕中的人物首服中，如第10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降魔成道”龕内的人物形象，头戴圆形尖顶毡帽，帽中有缝，面呈胡人相。

第19-2窟前立壁北侧佛龕下雕一列供养人，中为博山炉，左侧雕男性供养人，头戴鲜卑帽，帽筒较深，且向后披下（从侧面看，帽的中后部形成一条线），帽口饰宽带，着交领、窄袖衣，领、袖、下摆有缘，下着小口裤，穿靴。右侧雕一列女性供养人，头戴鲜卑帽，帽顶浑圆，个别帽顶雕为前低后高式，帽口束宽带，着交领、窄袖大襦，领、袖、下摆有缘，下饰间色裙，不露足。从此列供养人雕刻的帽子形式来看，男女帽子的样式有明显的差别。这种情况在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也有相同的表现，即男性

供养人戴A式帽，女性供养人戴B式帽。综观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的鲜卑帽，男女有别，样式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帽子式样逐渐有统一的趋势。

辫发。鲜卑拓跋部屡被南朝史书称为“索头虏”。“索虏”（见《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胡三省解释道：“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

在第7窟门拱西侧塔柱内雕刻的童子像，头部正中梳一圆形辫发，辫发从中一分为二向两侧弯卷形成“几”字形，头部两侧各一圆形辫发呈弯曲状下垂，其头饰为典型的索头；第8窟门左上角雕1躯伎乐供养人，额前梳发，两侧梳圆形发辫垂下。这种发式在云冈石窟甚为罕见。因为云冈石窟毕竟是由北魏皇室主持开凿的石窟寺院，而索头终归不是一种尊称。因而它不可能在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寺院中将别人的对自己民族的贬称过多地表现出来。这种形式的雕刻只在这两个窟中有所表现，其它窟中未见此种形象。

另外一种表现辫发的形式为头梳逆发。如第1窟、第2窟东西两壁中层佛龕两上隅雕出的供养人形象，面相为胡人相，梳逆发，动作较为夸张，显然是当时的工匠对鲜卑服饰或当时北方其它少数民族服饰的一种客观描述。

鲜卑服中男性服装主要

要有5种样式（图一一）：第一种为内着圆领衣，外罩交领，窄袖大袍至膝下，袖口紧裹^⑧，领、袖有缘，下摆镶宽边，腰束革带使腹部微向前突，大袍整体呈直筒形，下着小口裤，裤脚镶边，脚踏靴。服装质地厚重（第6窟东壁供养人像）。此类服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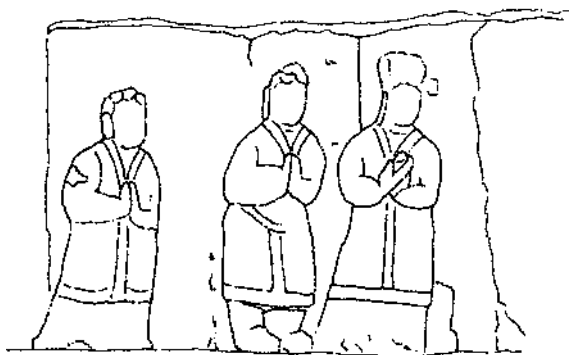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鲜卑服中男性服装样式 1. 前室 3. 后室南壁 4. 南壁

也有个别图像雕刻为裤口一直垂在脚后跟的形式。第二种样式为内着圆领衣,外着交领左衽衣,衣长至膝下,领、袖、门襟均有缘,下摆镶宽边,腰束革带使腹部微向前突,由于束带使左衽衣略有收腰,下着小口裤,裤脚镶边,足穿靴。第三种头戴A式鲜卑帽,内着圆领内衣,外着交领对襟大襦,长至膝下,大襦领、袖、门襟均有缘,袖子较宽松,袖口紧裹,腰不束带,下穿小口裤,脚部风化不辨。这种样式中已明显看到南朝汉式服饰的影子,将汉式服饰与当时的鲜卑服装相揉合,形成一种新的鲜卑服装样式。以上三种服装样式均有直筒形逐渐向梯形发展的趋势。第一期石窟中,服饰厚重,形体矮胖,因而觉其稚拙、笨重。到第二期雕刻中造像体态逐渐加长,同是一种服装样式,就显得俏丽多了。第四种服饰多数情况下是以胡人形象出现的,逆发胡相,上着交领衣,下着犊鼻裤(或为三角裤),赤足。第五种头戴尖顶圆形毡帽,面呈胡人相,着交领、窄袖右衽衣,衣长过膝下,领、袖有缘,腰身直筒不束带,下着裤。这种服饰较少见。

2. 女式服饰。

女性供养人一般与男性分行而列,大多数女性供养者头戴B式鲜卑帽,即头戴帽顶中部下凹或帽顶前高后低的鲜卑帽。在云冈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女性供养人帽式中多数为帽顶中部下凹的样式,第三期中较流行C式帽形。

女性鲜卑服主要有三种样式(图一二),第一种为内着圆领内衣,外着交领、窄袖左衽衣,衣长至膝



图一二 鲜卑服中女性服装样式

下,领、袖、门襟皆有缘,下摆镶宽边(也有可能镶皮毛宽边),左衽衣基本上呈直筒形,下饰间色裙(裙身雕纵向条纹,类似于今天的百褶裙)及地,裙摆较大,向后飞扬。衣服质地厚重。这种服饰在第三期的表现形式出现一些变化,衣身由直筒形向梯形过渡,并且左衽衣下摆向外撇,动感较强。第二种样式为内着圆领内衣,外罩交领对襟大襦长及膝下,领、袖、门襟均有缘,袖子较宽松,袖口紧裹,下着长裙。第三种为上着窄袖大袍,袍长至膝下,袖子紧裹,下着长裙及地。这种服饰无细部雕刻,只刻出大轮廓。以上三种裙子的长度都拖在地面上,所以无鞋子的雕刻。

鲜卑服饰的主要特点是防风御寒,适应北方寒冷风沙大的气候特点,是鲜卑拓跋部多年来适应自然、与大自然作斗争经验积累的具体表现。在具体雕刻中,衣饰的表现不完全相同,同一种服饰随着时间的推移细部雕刻亦有一些变化。在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中,反映第一期的供养人形象不多,而且个体较小,此时的鲜卑服基本上是交领窄袖衣和左衽衣,反映了早期鲜卑服饰的基本特点。云冈第二期随着大型供养人行列的出现,供养人的雕刻数量明显增多,鲜卑服样式也较第一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其细部雕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第二期的左衽衣袖较第一期明显加宽,但袖口还保留其原始做法,做得很窄,呈裹袖状。袖子上半部分加宽后,更适应于活动,袖口紧裹,一来承袭鲜卑服衣袖的传统做法,二来更具有实用性。再如其间色裙的下摆,在此时大多数向外扬,与第一期有很大的区别。它的服饰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北魏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衣冠服饰习俗的非常珍贵的形象资料。北魏后期由于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政策,石窟中供养人的服饰出现汉服,但着鲜卑服者并未有太多的减少,而是呈现出鲜卑与汉式服饰同时并存的局面。除去政治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鲜卑服更便于劳作和骑射,更具有实用价值。所以说鲜卑服对后世服饰特别是隋唐服饰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汉式服饰

北魏时期,南北双方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上虽然处于对峙局面,但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双方交流频繁,再加上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因而在石窟雕刻中,供养人服饰中的汉式服装占了一定的比例。孝文帝汉化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进行服饰改革,但其服装样式基本上是参照南朝官服制度

设计的,并无太多的独创。石窟中出现的汉式服装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1. 男性服饰。

冠饰是汉式服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男性供养人主要有小冠、笼冠和进贤冠等冠饰。

小冠,又称平巾帻。《舆服志》:“平上帻,服武官也。”在云冈石窟第11—16窟东壁佛龕下雕一列男性供养人,头戴小冠,身着V字领,宽袖大袍,领、袖皆有缘,双手合十,面向北方作供养状。头侧雕有榜题,惜年代久远,字迹已漫漶,现难以确定其人的真实身份。出现时间应在太和二十年服制改革以后。这种冠饰在龙门石窟雕刻中表现较多,例如古阳洞北壁中层第1与第2龕之间上部小龕下雕一列供养人,头戴小冠,内着圆领广袖大袍,袍的下摆呈八字形,衣纹密集,露出笏头履。这种服饰样式与云冈石窟雕刻中的样式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袖子更宽,衣纹更密集,并且有明确纪年^[9]。

进贤冠。第35窟东壁佛龕下帐形龕内雕一排供养人,头戴进贤冠,着交领(或V领)宽袖大袍,领、袖有缘,腹部微向前突,双手合十虔诚供养。该窟门拱东壁有延昌年问题记,大致可以说明着这一类服饰供养人的具体雕刻年代。这种冠饰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的一种主要冠饰。同样的冠式在第19—2窟主佛下部西壁供养人雕刻中亦有表现,头戴进贤冠,着V字领宽袖大袍,腹上部束宽带,下部风化不辨(图一三)。

笼冠。在第32窟门拱西壁思惟菩萨龕下铭刻石左侧雕一列供养人,其中前者头戴笼冠,着交领广袖大袍。这种冠饰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数量并不多,多数情况下是以图案化的表现形式出现的。这种服饰没有细部刻划,只雕刻出大轮廓。以上三种冠饰在云冈石窟出现的年代均为第三期(即太和十八年以后),反映了北魏太和改制后平城地区服饰发展的

实际情况。

男性供养人,一般均着交领宽袖大袍,领、袖有缘,大袍的下部呈直筒形,脚穿笏头履;还有的着交领广袖大袍,胸前束宽带,大袍的下摆向外飞扬,衣服宽博,衣袖褶纹整齐对称,潇洒脱俗。

2. 女性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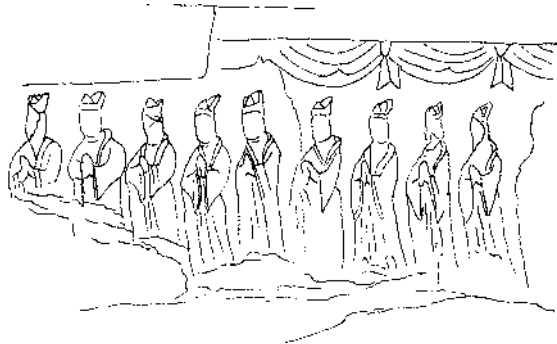
在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雕刻中,女性供养人一般不带冠,而是头梳高髻或花式高髻,着圆领(或盘领)广袖通肩衣;或着V字领通肩衣,衣纹雕以阴刻线,下着间色长裙及地,不露足,成为云冈石窟女性供养人汉式服饰雕刻的主流。女性供养人虽不戴冠,但发髻的梳法也呈现出多种变化。雕刻中主要有双髻、高髻(花式高髻)、飞髻等样式。

高髻,是石窟中表现最多的一种发式,且贯穿始终。头发在顶部高高挽起,多数情况下,呈花式高髻出现,具有较强的装饰性。第一期的高髻,只将头发束于头顶部呈馒头状,逐渐向高发展,到第三期髻的高度几乎与头的长度相等。第7窟西壁龕内雕一组供养人(五身),花式高髻呈多瓣状,基本表现为馒头状。饰项圈,斜披络腋,臂戴钏,下着长裙,双手合十双腿呈胡跪状。这种装束的供养人,有时也出现在佛龕的两上隅。因为缺乏文字资料,一时难以辨清供养者的具体身份。

双髻,在头部的两侧梳双髻。是北魏当时流行的一种发式。多出现在第三期雕刻的供养人群像中,一般位于帝后形象之左右,其真实身份多为侍者。

飞髻,其实是双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顶部双髻如飞雁凌空,装饰意味十分浓厚。第38窟南壁门拱东侧下部供养人,头饰飞髻,双髻于顶部向两侧展翅欲飞,动感强烈,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

女性供养人的服饰较为简单,基本上分为三种。一种是上着圆领内衣,外着交领、宽袖大袍至膝上,下着裙。另一种是上着圆领内衣,外着交领、宽袖大



图一三 男性服饰——进贤冠

袍及地。以上两种装束均不露足。第三种一般头饰高髻，着圆领（或者是V领）通肩衣，袖口较宽，衣长及地。

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中，着汉式服装的形象并不多，且个体较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北魏平城时期，尽管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政策，但在平城地区，保守势力仍然十分顽固，他们依然奉行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极力固守着鲜卑文化的内涵，全力保持着传统文化的遗存。同时也说明迁都洛阳后，平城地区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

3. 帝后服饰

在第三期洞窟中的第33、36、38窟等窟内四壁下层均雕刻了帝后供养人形象。都是以单列的形式出现的，一般在其头侧雕有榜题（图一四），可惜风化严重，已无法辨认其名。帝者一般头戴冠，着交领、广袖大袍及地，足穿笏头履。其身后紧跟一名侍者，双手持伞盖。侍者个体一般较小，头梳双髻或飞髻，着交领、小宽袖衣。

帝后（或王妃）一般头梳高椎髻，个别有梳花式高髻，内着圆领内衣，外着交领广袖大袍及地，有的领、袖有缘，腰束带垂于腹前，腹部微微向前突出，双手置于胸前，长裙向后飘逸，足穿笏头履，端庄典雅，显示出王后（贵妇）雍容华贵、缓缓而行的风采。身后雕一名侍者，个体较小，头梳双髻，着交领、小袖衣，衣长至膝上，下着裙，双手持华盖为贵妇遮阳。特别是第33窟西壁下层供养人的雕刻更为突出。由于风化剥蚀严重，局部形象已趋模糊，从现存的痕迹观察，仍可以看到当年的帝后风采。高髻（或花式高髻）向前倾或向后抛，密鬓拥面，着交领、广袖大袍，领、袖有缘，腹前飘带下垂，衣裙下摆呈大喇叭口，腹部向前微突，双手置于胸前。头侧虽雕有榜题，但已无法辨认。造像比例适中，体态雍容华贵，是云冈石窟帝后供养雕刻中的精品。

云冈石窟雕刻中的帝后供养人形象，与龙门石窟雕刻中的帝后供养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云冈的雕刻没有

成组的帝后供养群形式；第二，云冈的帝后供养雕刻简单。这也说明此时的平城地区，已不再是北魏的政治中心，帝王供养在此时此地不可能得到大量的表现，因此该题材也不可能成为石窟供养人雕刻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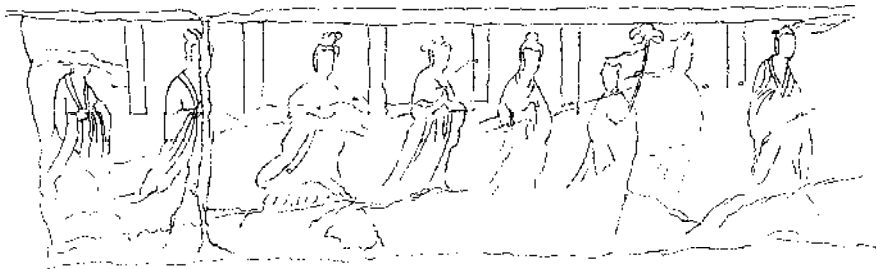
四、胡风汉服

这一类服饰在云冈石窟的表现不是很多，但也有所体现。一般情况下是融合了鲜卑服与汉式服装的样式，并将二者完善的结合，出现的一种新的服装样式。如第5窟门拱两侧各雕1躯供养人形象，均梳高髻，面容姣好，上着帔帛，下着长裙，一手握衣角抚胯，另一手持物置胸前，二供养人相对而视，动势呼应，显然是精心策划的，虽然其体势具有胡人风韵，但面相与服饰已明显汉化。第11窟东壁中层二交脚佛龛间雕刻一供养人，头戴鲜卑帽，身穿交领、广袖大襦，下着靴。这种装束显然是融合了鲜卑服饰与汉式服饰某些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服装样式。

在第三期的供养人雕刻中，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供养者着交领、窄袖大袍，这种服饰显然是将鲜卑服与汉式服装的某些特点揉和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服装样式，并且雕刻简单，一般无细部刻划。

服饰改革是孝文帝太和年间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项。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胡服亦被严加禁止，并开始按照南朝汉式服装款式制定官吏的冠服，虽然孝文帝颁布了“更造衣冠”的诏令，但由于鲜卑贵族中的保守派的阻挠和破坏，一时难于彻底施行。因而胡服和汉式服饰共同盛行，使这一时期的服饰更具特色。

服饰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文化传承现象，是生活民俗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又受到民族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折射。服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当时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北魏社会的变革情况，通过对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雕刻变化的调查分析，可以窥



图一四 帝后礼佛图

视北魏平城时期服饰流行变化的趋势,说明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通过分析,北魏服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北魏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王朝,而拓跋族的文化又相对落后。入主中原后,迅速发展并很快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因而其服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2. 鲜卑服饰与汉服共用,突出了鲜卑服饰。在云冈石窟雕刻中,第一、二期的供养人以鲜卑服为主,洞窟中随处可见头戴鲜卑帽、身着交领、窄袖大衣的鲜卑供养人,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服饰的主要特征。鲜卑民族的服饰质地厚重,且服装的领、袖多有缘,窄袖交领、小口裤、脚穿靴,突出了北方塞外气候寒冷的特点和适应于马上行动的民族特性。随着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深入进行,汉式服装逐渐在北魏的平城地区流行。但鲜卑贵族仍顽强地捍卫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而鲜卑服饰在平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汉式服装在推广流行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鲜卑服(胡服)的优点,使之更加适应实际需要。这一时期的汉式服装的领、袖基本上均有缘,正是受鲜卑服的影响,或许是当时社会服装流行的新思潮的再现。因而云冈石窟供养人服饰是我们研究北朝时期服饰的第一手材料。

3. 鲜卑服的影响源远流长,对隋唐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隋唐雕刻和绘画中随处可以找到鲜卑服饰的影子。诸如交领、窄袖及足下蹬靴的样式比比皆是。因为鲜卑服更具有实用性。

4. 云冈石窟雕刻中供养人服饰的变化客观上反映了北魏社会改革的一个侧面。北魏王朝在不断扩大疆土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孝文帝时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政治制度和民族风俗的改革,加快了鲜卑族民族化进程的速度,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石窟中雕刻所反映的服饰变化正好说明了改革变化及融合的过程。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在它统治时期,将佛教奉为国教,令佛教“敷导民俗”^[10],同时大兴土木,开窟造像宣传佛教,使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北魏统治者在学习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

式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没放弃对鲜卑文化的继承。窄袖、衣裙直筒(有时衣裙较短)着裤、穿靴正是鲜卑服饰的最显著的特点,这些从供养人服饰雕刻中不难看出。至孝文帝时期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接受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反映在石窟供养人雕刻身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为通肩大衣,细部雕刻出现变化,衣袖由窄变宽、宽袖仅雕刻在肘部以下,大衣下摆由直筒形逐渐变为呈“八”字形,裙裾飞扬,使供养人雕像出现了笨拙剽悍与儒雅飘逸两种截然不同的造型风格。同一题材,同一服饰,不同的表现手法,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宽袖、衣裙向外飞扬的服饰特征是汉化政策在石窟中真实自然的流露和真实的反映。石窟本身是一种文化载体,通过它可以了解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动态,找到其发展变革的脉络。云冈石窟供养人的雕刻虽不是石窟雕刻中的主要题材,但它的雕刻确是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概况,为我们研究北魏服饰史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本文插图由张建新绘制)

[1] 古代印度贵族的一般服饰为:斜披络腋,胸前着有蛇饰,臂戴钏,下着长裙。

[2] 慧远《沙门袒服论》。

[3] 田相衣,又名水田衣。唐代王维《过卢四员外宅看饭僧共七题韵》:“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

[4]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5]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7] 吕一飞先生在《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一书中阐明了相同的观点,即鲜卑帽的“顶部大体为方形,又略为有一点圆,皆垂裙至肩”。

[8] 史载中的小袖袍大概如此。《梁书·诸夷·河南王传》中称吐谷浑男子穿“小袖袍”。

[9] 详见《龙门石窟内容总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0] 《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1977年。

(作者系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